

往事如昨

父母的婚姻

于建章

父母 1961 年在烟台相识。彼时，母亲刚从烟台护校顺利毕业，进入毓璜顶医院实习；而父亲早在 1959 年于潍坊医学院毕业，已是该院一名正式医生。医生与护士，本就是病房里最默契的搭档。日复一日地并肩值守、默契配合，两个年轻人渐渐相知相熟，朴素的情愫在朝夕相处间悄然滋生。

实习结束后，母亲被分配至济南市立第四人民医院工作，烟台与济南相距数百里，在车马缓慢、交通不便的年代，两人相见实属不易。山水隔不断相思，一封封书信成了维系情意的唯一纽带。

1962 年正月初三，父亲准备从潍坊老家返回烟台上班，未曾提前告知，他便顺路先到了海阳徐家店的姥姥家中。人生地不熟，他是一路打听听着母亲的名字才寻到家门的。

父亲带来了奶奶提前备好的四个黑面饽饽，那是父亲一家人满满的诚意。母亲后来笑着回忆，那饽饽带着淡淡的酸味，但并非存放变质，而是寒冬腊月里，面本身发酵时便已有的酸味。常言道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。姥姥当即吩咐姥爷，请来几位至亲一同陪父亲吃饭。饭菜虽简单，却已是家中最高规格的款待。

父亲的到来，让母亲既欢喜又羞涩。欢喜于他的意外奔赴，羞涩于略显寒酸的见面礼，两颊年轻的

心，因这场奔赴贴得更近。母亲咬着略带酸味的饽饽，心底泛起的却是丝丝甜蜜。当晚，姥姥拿出姥爷参军时的军用毛毯给父亲盖。次日晨，母亲步行十里山路送父亲去火车站，一路依依不舍，并叮嘱父亲春节假期也要安心坚守岗位。

1962 年 8 月，母亲独自一人从济南回到烟台，与父亲在民政局登记领证，喜结连理。婚后的生活依旧清贫朴素，父亲住在医院集体宿舍，母亲前来团聚时，便挤在医院专门为探亲家属准备的小宿舍。

三天后，父母一同返回海阳，与至亲邻里围坐一桌，一顿家常便饭，便算作圆满婚宴。随后，二人匆匆赶往潍坊，在潍坊车站，父亲的两位表弟早已骑着自行车在出口等候，他们从潍县（今寒亭区）固堤公社赶了五十多里土路，满心热忱地迎接新人。

那时的母亲从未骑过自行车，更未坐过自行车，乡间土路崎岖颠簸，车身一晃，她不慎从后座摔落，脸朝下重重磕在石头上，半截门牙当场磕断。时隔六十余年，母亲谈及此事依旧带着几分羞赧与笑意，庆幸磕在那块石头上，有石头垫底，只是磕掉半颗牙，却护住了脸庞，没有破相，真是万幸。

家中早已宾客满堂，处处都是淳朴真挚的祝福。宴席散尽后，奶奶小心翼翼掏出一方小手绢，层层展

开，里面包着一卷崭新的钞票，全都是一元的面额，那是众亲友送来的近十元新婚红包。母亲再三礼让，她心疼老人生活拮据，执意让爷爷奶奶自己留着贴补家用。

聚少离多的异地生活，一直持续到 1964 年 1 月。经组织协调，两人终于得以同城相守。因城市医院编制已满，他们主动选择下放到基层，父亲分配至牟平县城关公社（今宁海街道）卫生院，母亲任职于牟平县人民医院。

初到牟平，两人居无定所，只能暂住在县招待所，一住便是五天。幸亏牟平人民医院工会的刘主席热心奔走，帮忙在南关村租下一间民房。陋室虽小，却足以遮风挡雨，这一住便是十六年，两个哥哥与我都在此出生长大，一家人也自此在牟平落地生根。

1980 年，牟平县人民医院建成首批家属楼，优先分配给院长、科室主任与护士长。彼时身为外科护士长的母亲，因勤恳敬业、恪尽职守，有幸分得一套住房。至此，父母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在牟平安稳扎根，相守余生。

母亲今年已八十七岁高龄，岁月染白青丝，也沉淀下一生的温婉从容。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她每日笑意盈盈，时常念叨：“现在的日子这么好，若是你父亲还在该多高兴啊！”

我是优秀员工

叶展韵

那是我在那家食品厂打工的第四年，工厂重新投票选举了新厂长。

新厂长是个大学生，个子不高，胖胖的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食品行业在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的时候是最忙的，常常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订单。有时车间人手不够，就需要后勤人员帮忙。我是仓管员，负责把车间做好的成品发往后勤部，后勤部再外发合作酒店。

工厂有六个部门，其中四个是生产部门，还有一个后勤部和一个品控部。端午节前两天，鲍鱼部有个订单着急发货，需要加班。厂长安排后勤部门的一位人员去帮忙，他问厂长给加多少钱，厂长说就去帮忙打包两三个小时，不加钱。那个人就不去。厂长又找到我，我二话没说，换上工作服就去了。

新招聘的原材料仓管员家距离工厂较远，有时供应商天还不亮就来送货，需要称重、点数量，仓管员来不了，厂长安排一位后勤人员帮忙收货，他说不熟悉货物干不了。于是，厂长又找到我。我没有提什么条件就答应了，这样我每天早早地来到工厂，帮忙收货点货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。厂长也很满意。

工厂洗衣房的阿姨家里有事，需要请假回老家一周，但是食品行业卫生最关键，员工的工衣不能不洗。厂长安排我给洗衣房阿姨顶岗一个星期，且不能耽误我本身的工作。这样，每天下班后，我在工厂加班，把工衣洗完晾晒，第二天早晨提前到工厂，把工衣发给车间工人，直到洗衣房阿姨回来上班。

生产车间离不开水，员工上班都要穿雨鞋，员工若辞职雨鞋需交回仓库。有的老员工让我把旧雨鞋丢掉，找采购员买一批新的，说厂子不在乎这点儿钱。我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，没有丢，全部都消毒洗刷干净。厂长对我的做法也给予了肯定。

年底了，公司总部给了工厂一个优秀员工的名额。我们工厂有一百多号人，有六位部门主管。一天晚上下班后，厂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对我说道：“虽然咱们工厂有六个部门主管，但我考虑来考虑去，这个优秀员工名额只能给你。每次工作上叫你额外加班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说‘不’，从来没有要求加钱，都能尽职尽责地干好。”

公司年会那天，厂长把刻有我名字的“优秀员工”奖杯发给我，并奖励了我一部苹果平板电脑。

汪国真在《山高路远》一诗里写道：“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”在以后打工的日子里，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，无论在哪里都起到表率作用，一直以优秀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
护麦公约

姜惠泉

农历四月末，小麦在暖风的吹拂下，一片金黄，仿佛给大地披上了华丽的盛装。我站在麦田中间，望着联合收割机卷起的一道道烟尘，像一条条翻滚的苍龙。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了，我仿佛又看到五十年前，那个收获麦子的季节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在小麦快要成熟时，老师就会要求学生每人写一篇《护麦公约》。公约的内容很简单：不许到麦田里“揪头捋穗”，不许“推小钢磨”——也就是不许偷偷搓麦粒吃。写完之后要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，老师还会让我们挨个念一遍、表个态。说白了，这份《护麦公约》就是一份让孩子管住嘴巴的决心书。

虽然《护麦公约》大家都写了，老师也要求同学之间相互监督，但真正能做到的，却鲜有人在。

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孩子们连茅草根里的一丝甜味都甘之如饴，更何况那成熟麦粒的清香。每天放学去田间地头割草挖野菜，是我们的必修课。把挖回来的野菜喂猪，割回来的青草晒干烧火做饭，家家户户如此。

我们挎着篮子，来到麦田边，看

见四下无人，就赶紧跑进麦田深处蹲下。揪下几个麦穗，用两只小手反复搓，一颗颗碧绿的麦粒就被搓了出来，再用小嘴吹去麦糠，同时还要用两只手不停地倒来倒去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一小把碧绿如玉的麦粒就呈现在眼前。我们都把这种搓麦子的方式叫“推小钢磨”。一把把麦粒摁在口里，那种清香瞬间散发开来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吃上几口就不敢再吃了，因为这些囫囵麦粒不好消化，吃多了会腹胀难受。

吃完后还要找地方把手洗干净，否则那两只绿油油的手掌就会暴露无遗。

偶尔也会揪一些放在篮子里，上面盖着野菜，拿回家里，放在灶膛里烧一烧，或是用锅蒸一蒸，比生吃好多了。但是，这样做很危险：一是会受到家长的批评；二是大队经常派民兵把守在村口，专门搜查藏匿麦穗的。一旦被逮到，轻则没收，重则被带到大队示众。

有一次，大队书记的大伯没能躲过去，被民兵逮了个正着。人带到大

队部，篮子挂在脖子上，村里的大喇叭跟着响起，点名批判。

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一个模糊的疑问：明明地里长着麦子，为什么连几穗都不能碰？那个年代，没人回答孩子的问题，大人也只是悄悄叹气。后来，我渐渐明白了——护住的哪里是麦子？麦子年年都会再长。护住的是“公家”和“私人”之间那道不能逾越的线，是那个年月里人人都要守着的规矩。

后来，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“推小钢磨”搓麦穗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自家地里的麦子，想搓几穗就搓几穗。可奇怪的是，当护麦不再需要公约，当饥饿真正远去，麦粒那曾经让人“欲罢不能”的清香，反而慢慢变淡了。随着农副产品日益丰富，瓜果点心走入寻常百姓家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麦粒的清香再也勾不起人们的食欲，偶尔吃点也不过是种“忆苦思甜”的回忆。

想到这里，我顺手揪下几穗还没有成熟的麦穗，用手搓了起来——一样的翠绿，一样的清香。